

源头活水

王向远 著

日本当代历史小说



中国历史文化

宁夏人民出版社



◎
人
文
日
本
新
书

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 王晓平

【顾 问】

中西进 川本浩嗣 乐黛云 严绍盪 文洁若 严安生

【编 委】（按姓名笔画排列）

马兴国 卞立强 王向远 王金林 王若茜 王 勇
王晓平 刘立善 孙东临 严绍盪 李 征 林少华
邱 岭 陈德文 陈生保 胡令远 郑民钦 哈若蕙
高文汉 高 伟 高 宁 高慧勤

違いの認識は異文化理解の出発点
——『人文日本新書』出版を祝して

认识差异是理解不同文化的起点

——祝贺“人文日本新书”出版

日本大手前大学校长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川本皓嗣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在日本，以前常听到“同文同种”的说法。日本人相信自己 and 中国人没有多少不同的地方。近代以前，那样热心地学习汉学，是因为不是把它当作中国固有的学问，而是认为它是普遍的“人”的学问。但是，其结果，就产生了一个错觉，那就是以为学习同“文”者就具有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直到近代以后这种错觉仍然存在着。

另一方面，中国人虽然一点也不认为自己像日本人，但就像美国人多觉得加拿大像是美国的一部分或者一个“准州”似的，中国人不也觉得日本文化像是中国文化浮浅的模仿或者派生物吗？

当然，这两方面都是很大的错觉。而且，不用说，对不深知的对手却以为知之，这是极其危险的。没

有看透相互的不同，双方都认准同样的“常识”是通用的，于是便容不得细微的龃龉，对不解的对方态度焦躁起来。

理解不同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认识相互的差异。从相互是不同的这一点出发，那么粗看起来是“不当”的“出格”的东西，实际上作为有魅力的、有启发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人的文化的一种形态，正是可以如实接受的。

宁夏人民出版社不久以前出版了钱林森主编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全十卷)，在重新审视世界主要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往和相互理解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这一次又聚焦于邻国日本文化与中日关系，进而推出更大规模的王晓平主编全数十卷的“人文日本新书”。它们都是第一流的学者新写问世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深掘问题所在、精读原典、并面向一般读者好读易懂为主旨。

其中既有和歌、《万叶集》、谣曲，也有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既有日本的敦煌文书、唐诗、《长恨歌》、《三国演义》，也有在唐留学过的高僧空海和最澄；既有东洋学与儒学，也有相扑和漫画；既有原始宗教、民间故事，也有风花雪月、恋爱和旅游，还有对不同文化间误读的研究。真可以说善善尽善。

这套新书，辨明中国和日本的不同，无疑对于中日关系更加亲密会作出巨大的贡献。有中国方面这样的壮举于前，日本也不能不认真行事。

2004年6月



“人文日本新书”序

王晓平

数到与我国文化关系密切的别种文化，不论是说古代，还是近现代，日本文化都要算其中之一。今天，两国文化结束了以单向流动为主流的文化交流史，开始了更加频繁、更加深刻的相互作用的进程。在许多文化领域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同而大异。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举出很多，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两种文化的相邻关系。地球村内，比邻而居。如何看待对方，如何与对方相处，既是每天要解决的课题，又是一个解决不完的课题。因为对方在变，自己也在变。由于相邻，其共同点和相异点的效应都被放大。前者使两种文化彼此发挥着镜鉴和舟渡作用，后者使彼此的摩擦和冲撞频率倍增。

还有一点，那就是中日两国民族都有珍视人文的传统。试想，如果古代日本没有这样一点，中国文化便不会在那里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同样，如果中国文化没有这样一点，恐怕近代日本文化也不会带给中国文化那样多的新内容。而各自的人文，却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常常被两国文化的相似点和共同点所迷惑，将它夸大

而且忽视了各自原本不同的背景和文化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在建构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两国传统文化都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两国的非传统文化正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然而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以发展国际化时代的新文化，两者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而其选择则往往大相径庭。我们正可以在这同与异的辨析之中，增长很多见识。

对于我们邻国的文化，我们需要有深度认识。

研究日本，不仅是它的政治经济，也包括它的历史传统、价值体系、社会结构、文化特征等，这种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日本文化的特点，日本学者有许多阐释，例如杂种文化论、优等生文化论、换装文化论、换车文化论、日本文明论、第五种亚文化论等等。关于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日本学者也有很多说法，例如卫星文化论、非卫星文化论、先为卫星文明后为非卫星文明论、同母文化论、异母文化论等等。不可否认，这些说法有的在说明日本文化的某个侧面时曾起到过一些作用，不过它们是否都概括准确另当别论。仅靠这样的判断，能否深刻说明日本文化的传统和现代，是很值得怀疑的。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又通过各种思潮的合力始终与其保持着距离。日本文化不仅历史上独自走过了漫长的路，而且今天也与我们各在一途。一句话，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把日本文化看清楚，用我们自己的话把它说个明白，研究出深度，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种研究，首先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西方世界虽然对中国与日本都有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研究与吸取，但是从总体上，没有跳出西方价值中心的

圈子，用的还是从西方文化中抽取出来的框架和概念。中国学者应该对日本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凝眸中国，守住本土情怀，是今天日本文学研究的生命线，而我国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义理、辞章、考据之学的优厚积累，则是我们能在这一领域内掘进的推动力。

同时，今天我们发展经济的大文章，是在市场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下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大文章，也要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做。这两篇大文章跟国家的“硬国力”和“软国力”有很大关系。不断应时而变，调整与别种文化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在今天，研究域外文化，已经不仅是为了实施“拿来主义”，为了“洋为中用”，因为我们不能“拿来”，或者暂时不能“拿来”，不能为我所用的，有些也需要我们去跟它打交道。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在前所未有的大环境中自处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要有更大的眼界、更敏锐的洞察力、更强的免疫力和应对能力。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仅期望有“人文日本”，而且更期望有“人文印度”“人文阿拉伯”等等。在我们不断推出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倾听他者的声音也是必要的，这样，像“人文日本译丛”这样的选题，相信也在期待之中。来自外部的“单边主义”或者变相单边主义的压力、锁进不锁出的新“锁国心态”和内部对多元文化共存现实的“不适应症”，不会因为经济的强盛而自然消失，需要的是不懈的沟通磨合和彼此对视，这一点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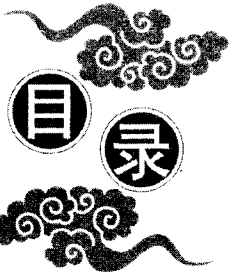
从学者个人来说，恐怕也不难感受到学术环境的变化。社会文化结构变化剧烈、雅俗界线模糊、生活节奏

加快、信息需求猛增，知识分子对非本专业知识需要的范围在扩展，而可能用于阅读的时间却在减少。学术著作，不仅需要以严整透彻的面孔登场，也需要以比较轻捷亲切的面孔，走进大众中间。在把学术书写“正”之外，再要求写短，写得耐读，就又要多下一层功夫。像日本的很多事情，在等着有人能给我们说个明白，哪怕把足够真实充分的背景材料提供给我们也好。

我们希望，收入这套丛书的每一单册，能够不炒旧饭，小题精做，拿出作者真正属于自己精心思考过的东西来，就一个日本人文题目说清楚来龙去脉。我们有心切实为文化发展做事情，就有理由相信，这套书会越出越精彩。

甲申年五月
(2004年7月)





绪论 / 001

第一章 从“三国志”开始 / 015

- 一 《三国志》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 017
- 二 “柴炼三国志”和陈舜臣《秘本三国志》 / 026
- 三 “北方三国志”和“三好三国志” / 034
- 四 “伴野三国志” / 042

第二章 战后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开拓者井上靖 / 0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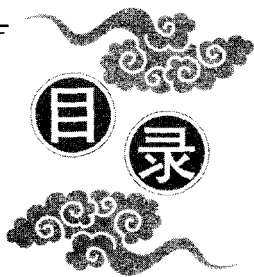
- 一 以中日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天平之甕》 / 051
- 二 独具特色的西域小说系列 / 055
- 三 成吉思汗·杨贵妃·孔子 / 060

第三章 历史小说巨匠海音寺潮五郎、司马辽太郎的中国题材 / 067

- 一 海音寺潮五郎的《蒙古来了》及其他中短篇小说 / 069
- 二 关于兵法家孙子的传记小说《孙子》 / 077
- 三 文学“父子”：海音寺潮五郎与司马辽太郎 / 083
- 四 司马辽太郎的《项羽和刘邦》与《鞑靼疾风录》 / 088

第四章 得天独厚的华裔作家、中国历史小说的第一人陈舜臣 / 095

- 一 “人间派”推理小说及其中国历史文化含蕴 / 097
- 二 中国历史人物画廊 / 108



三 波澜起伏的古代中外、中日关系 / 117

四 风雷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史 / 126

第五章 古今中华任挥洒的伴野朗 / 139

一 在北京发现的《五十万年的死角》 / 141

二 帝王将相传记小说 / 144

三 刺客·侠士·反骨·探险家·谋臣 / 151

四 猎奇的中国现代史题材 / 161

第六章 中国题材历史小说新旗手宫城谷昌光 / 169

一 由金文、甲骨文进入中国历史文化 / 171

二 殷商题材的三部长篇小说 / 176

三 春秋战国十大人物的复活 / 181

第七章 原百代、塚本青史、田中芳树、浅田次郎等各显身手 / 193

一 原百代的《武则天》与津本阳的《则天武后》及其他 / 195

二 塚本青史的秦汉历史人物 / 200

三 田中芳树的隋唐宋元题材 / 208

四 浅田次郎的近代史题材 / 218

五 学识不足但充满想象力的新生代作家 / 220

后记 / 229

出版者的话

在日本文学中，“历史小说”，也称“时代小说”，或作“历史·时代小说”^①，是近现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和样式，它与镰仓时代的“战记物语”，江户时代的“军谈”“讲话”等一脉相承。日本近现代的历史小说肇始于明治时代，近代著名作家森鸥外是近代日本历史小说的开创者，此后的幸田露伴、芥川龙之介、菊池宽、长与善郎等也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和剧本。到了1940年代，吉川英治、中岛敦等人的历史小说颇受读者欢迎，从那以后，历史小说被归为与“纯文学”并立的“大众文学”一类，和推理小说一起，成为大众文学中最重要的两种文学类型。而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当代文学中，历史小说的创作更为繁荣，出现了中里介山、直木三十五、大佛次朗、海音寺潮五郎、井上靖、司马辽太郎、柴田炼三郎、山本周五郎、山田风太郎、五味康佑、山冈庄八、池波正太郎、陈舜臣、藤泽周平、早乙女贡、平岩弓枝、南条范夫、伴野朗、北方谦三、白石一郎、津本阳、龙庆一郎、宫城谷昌光、新田次郎等一系列大作家，拥有大量稳定的读者。历史小说家所产生的影响、所获得的荣誉和尊敬，总体上似乎也高于其他类型的作家。例如，日本明治维新

^① 在日本，虽然“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属于同一个概念，但笔者认为，从汉语语感的角度看，可以用这两个概念来概括两种不同倾向的历史题材小说——“历史小说”较为尊重历史事实，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是有史料依据的；“时代小说”只是将作品的舞台背景置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中，而人物和事件可以是完全虚构的。但目前日本评论界尚没有这样的界定，这就在有关作家作品的评论和研究中，造成了诸多不便。

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由司马辽太郎等历史小说家们所呈现出来的。当代日本人对明治维新所抱的自豪感，对维新英雄们的热爱，很大程度上来自司马辽太郎及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司马史观”。他被誉为“国民作家”，在日本各阶层影响之大，是历史小说之外的其他类型的作家难以匹敌的。

当代日本历史小说，按其取材类型，基本上可分为日本历史题材小说和中国历史题材小说两大类。所谓“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就是以中国历史为舞台背景、以中国人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据笔者观察，在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中，日本历史题材的作品占到百分之九十左右，中国历史题材的作品约占百分之十，其他国家的题材极少，可以忽略不计。换言之，当代日本的历史小说，从题材上看是由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两方面构成的。从1940年代以后直到今天的半个多世纪中，主要以中国历史小说创作而知名的作家有中岛敦、武田泰纯、陈舜臣、伴野朗、官城谷昌光、塚本青史等，而更多的作家是日本历史题材与中国历史题材双管齐下，其中有海音寺潮五郎、井上靖、司马辽太郎、柴田炼三郎、原百代、三好彻、北方谦三、荒俣宏、津本阳、田中芳树、安西笃子等，近年来又出现了桐谷正、井上佑美子、藤水名子、酒见贤一、新官正春、东乡隆、中村隆资、真树操、立石优、太佐顺、森福都、菊池道人等中国历史小说新作家，加在一起有二十多位。而且战后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中，作家们也形成了明显的作家“世代”与“群体”，形成了代代相继的梯队结构。假如按照日本人划分年龄阶段的方法，将十年作为一“代”（例如“三十代”指的是三十岁至三十九岁，“四十代”指四十至四十九岁）来看当代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作家梯队结构的话，那么，从1950年代至今的半个多世纪，已经有五代作家陆续登场——

第一代：1910年代出生，1950年起步：井上靖、海音寺潮五郎等；

第二代：1920年代出生，1950年代末起步：司马辽太郎、陈舜臣等；

第三代：1930年代出生，1970年代起步：伴野朗等；

第四代：1940~1950年代出生，1990年代起步：宫城谷昌光、
塚本青史、田中芳树等；

第五代：1960年代前后出生，1990年代末起步：藤水名子、井上
佑美子、酒见贤一等。

这就形成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家世代之间的纵式的梯队结构，而且从横向上看大部分作家之间具有明显的师承、私淑乃至同学朋友关系，具有一定的群体性和连带性。如“日本历史小说第一人”司马辽太郎与“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第一人”陈舜臣是大学同学，关系密切；司马辽太郎以海音寺潮五郎为师，创作上受到海音寺潮五郎的提携；伴野朗、田中芳树以陈舜臣为师，在创作上受到陈舜臣的影响；宫城谷昌光私淑海音寺潮五郎，在创作上受到海音寺潮五郎的影响。总体上看，老一辈中国历史小说家，对新一代的作家的崛起有相当的垂范、带动作用。田中芳树在一段文字中，曾谈到这个问题。他写道，“鲁迅说过：地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它便成了路。所谓‘中国题材’的创作现在正成为一条大路，都是那些筚路蓝缕的前辈先生的恩惠。”^①这段话不仅表现了后辈作家的知恩和谦逊，也表明了由于世代交替、互相提携与互相影响的关系，当代中国的历史小说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坛”。虽然这个“文坛”的规模还不太大，作家人数不太多；虽然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在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中所占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但由于作家的勤奋和多产，作品数量却颇为可观。据笔者的大体统计，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光长篇作品就有二百种左右，短篇作品数量更多，收编成集的短篇小说就有几十部，三分之二以上是1980年后出版的。其中，陈舜臣一个人的长篇小说就有三十部，宫城谷昌光长篇小说就有十几部，而且多卷册长篇居多。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中，获得直木奖等各种文学奖的作品，成为畅销书

① 陈舜臣、田中芳树：《谈论·中国名将の条件》，第174~175页。德间文库2000年版。

或畅销书的作品，所占比例也不小，影响也相当大。

1950年代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至今，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创作呈现出越来越繁荣的景象，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日历史文化是同根同源的关系。一直以来，日本人将中国的古典视为自身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从文化人到普通读者都没有多大隔膜感。尽管近代以后中日之间经历了战争等种种波折，但即使在主张“脱亚入欧”的明治时代前期，中国历史文化也没有被“脱”掉，而且即使是“脱亚论”的首倡者福泽谕吉本人，其汉学修养也相当不错，他能读懂文言文，还擅长汉诗和书法。在近代以西化教育为主导的教育体制下，日本这几代人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修养从整体上看是差多了。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日经贸、文化关系越来越密切，日本国民对中国越来越关心和关注，阅读有关中国方面书籍的人越来越多，学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都成为日本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繁荣和发展的现实的与心理的基础。

小说家们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取材，固然存在着语言上的巨大阻隔和障碍，但是，由于日文中也使用汉字，汉字就成为日本作家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有力的纽带。汉字使日本作家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连带感和亲近感。作家们不是将中国历史文化作为纯粹的异国文化，而是将中国历史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源头，以寻求日本人精神故乡的心情进行创作。正如宫城谷昌光所说：“阅读古代中国的史料，很有意义。我想，探寻一个词在中国的原意，岂不就是探求日本人思考的源流吗？”又说：“我写以中国古代为舞台的小说，并非要向现在的日本读者炫耀自己得到的知识。而是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想弄明白日本究竟是什么，所以才写。”^①他甚至觉得，使用汉字成了自己思维灵感的重要源泉，一旦对汉字的使用加以控制、对汉字的兴趣减弱的时候，连故事情节的构思都会受到严重制约。想想除日本之外，原本像日本一样也使用汉字的东亚有关国家，1950年至

① 宫城谷昌光、秋山虔：《いま〈楽毅〉問いかけるもの》，原载《波》1999年10月号。

1970年代后，却在某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主导和主张下，为淡化和摆脱中国文化的影 响，将其民族语言中本来就有的汉字人为地完全剔除，宁愿付出因同音词过多而有可能让人不知所云的代价，宁愿付出让自己的国民读不懂用汉文写成的大量民族历史文献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相比之下，在日本，尽管明治年代有人在讨论文字改革的时候，曾提出废除日文（包括汉字），使日语拉丁化，但是正如五四时期中国的汉字废除论一样，那只不过是特殊背景下西化思潮的一种反映而已。事实上，日本一直没有试图用废除汉字的方法来“纯洁”其民族语言，而是把汉字作为其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种健康的、开放的文化襟怀。日本文化能够一直充满活力，日本文学的高度发达，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创作与繁荣，无疑都得益于此。

除了有着同根同源的文化、除了汉字的纽带之外，日本对中国历史典籍及文学作品翻译也相当重视，积数百年之功，迄今已经相当完备，许多重要作品都有数种不同的译本出版，特别是规模宏大的《中国古代文学大系》（全六十卷）和《新释汉文大系》（全一百一十六卷）等丛书的问世，作为畅销书，为作家们阅读中国文献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那些不懂汉语的日本作家只要利用各种各样的译本，就可以系统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从中国历史典籍中取材也就变得切实可行了。同时，日本汉学在日本学术史上已经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学者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历来相当重视，他们对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水平并不在中国学者之下，例如对甲骨文的研究、对《史记》的研究、对唐诗的研究等，甚至令中国同行钦叹。这种研究进一步强化了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亲近感、认同感，也为作家们学习、理解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资料。

另一方面，日本的历史小说具有悠久传统，12世纪的《今昔物语集》《平家物语》等战记物语，都属于历史小说或历史文学。上千年的取材使得日本的历史题材几乎被写尽写透了。有时候一个重要人物（如源义

经、丰臣秀吉、武田信玄、西乡隆盛、坂本龙马等)和重要事件(如幕末京都的浪人组织“新选组”等),竟有十几部乃至几十部长篇小说去写。作家们不免会感到,再写下去,势必难出新意。因此,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求灵感和题材,是有见识、有头脑的作家的必然选择。1994年,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新一代作家藤水名子曾在《长安游侠传》的出版招待会上说过:“以日本为舞台的时代小说已经有很多伟大的作家了,好像再也没有跻身其中的余地了,所以我就开始写以〔中国〕大陆为舞台的作品。”藤水名子的感受和选择在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作家中,恐怕是很普遍的。一旦做了这样的选择,光辉灿烂、绵长悠久的历史,就打开了日本作家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想象力,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题材宝库。

二

日本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创作,体现出了某些基本一致的倾向。

第一个是主题倾向,总的来说是褒扬中国历史文化。

从主题倾向上看,作家们在作品中普遍表现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景仰之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所抱有的善意的理解和尊重。日本当代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作家,基本上都是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至少是重视中日关系的人士。1950年代1960年代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中日两国没有正常邦交的情况下,有关作家由于种种机缘,来往于日中之间,起到了桥梁与沟通作用。例如,那时的井上靖、陈舜臣、司马辽太郎等,多次来中国访问和取材,他们回去以后所写的纪行文章,对中国虽有不理解或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但基本上是尊重中国国情的,是善意的。其中井上靖先生还担任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等职务,为中日两国的交流付出了很大努力。即使是对“文化大革命”那一特殊时期的中国,有关作家仍抱着善意的理解的心情。如中国题材作家伴野朗曾作为朝日新闻社

的记者常驻中国，在1973年与他人合著的图片资料集《中国大观》中，所收照片均是反映文革时期中国社会光明面的，而对当时政治的混乱和经济的凋敝局面并无反映、指责或批判，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允许范围有限，也反映了战后朝日新闻社对中国的一贯立场和态度，同时还表现了伴野朗本人超越意识形态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敬及对现代中国的尊重。

对中国的现实是如此，对所描写的中国历史更是如此。在有关作家的作品中，弘扬中国文化，将中国历史人物英雄化，是一种普遍的倾向。即使是写中国历史上一些有负面评价的、有争议的人物，他们也从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不对历史人物做过多的道德评价，甚至站在肯定的角度上作出相反的评价。例如，在宫城谷昌光的笔下，淫荡的夏姬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善良的女人，原百代的《武则天》站在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努力描写出作为一个明君圣主、一个伟大女性的武则天的形象，扭转了长期以来站在男权主义角度对武则天的荒淫残忍的定性。再如，从《汉书》开始，史家们均站在维护王朝正统性的立场上，视王莽为谋反者和篡逆者，而给予否定的评价。塚本青史在以王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王莽》中，却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王莽。在他笔下，王莽是一个少有大志、刻苦读书、笃信孔孟学说、富有责任感、勇于改革的政治家，其改朝换代也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支持。而浅田次郎在《苍穹之鼎》中，甚至对晚清的慈禧太后、李鸿章，都从另外的视角予以正面的描写和评价。

第二个是取材倾向：大多数作品都取材于古代，主要是先秦两汉魏晋，而近现代史取材偏少。

日本作家的中国历史小说，多选中国古代史题材，而近代史题材较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上说主要是因为上千年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已经融入日本文化中，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人物、典故，日本已经“视为己有”，不把它看成是纯粹的外来文化。具体地说，这又与三部中国典籍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极有关系。第一部书是司马迁的《史